

梅雨连天，潮气遍地，体感极度不适。每年如此。正想着现在如此，老来何堪，忽传来了元章先生归去的消息。

就在今年春节，我去叶家拜年。元章先生九八之龄，照样神清气爽，健谈善论，百岁大寿似乎指日可待。谈及上海诗词学会准备为他开研讨会的事，元章先生取笔展纸，用细若绿豆的字开出一批专家名单，又说若经费不足，可减少与会人数和会期，但一定要确保会议质量，尤其是学术含量。我一面听，一面想起他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，至今都写信或致电向学会提建议。作为上海诗词学会的顾问，他也多次写信给我，说各地诗词学会大多重创作轻理论，重活动轻研讨，久而导致思想者匮乏，笔杆子稀缺，空负学

会之名，实乃一般诗社而已。上海的情况好一点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元章先生早年研究经济，后在多所院校任教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研，深知理论于实践的重要性，故而强调“唯有狠抓理论创新，方能提高创作质量”。此话尖锐且反复强调，不仅戳中了本会的短板，更击中了几近所有“学会”乃至“协会”“联合会”的软肋。原因十分明显，创作活动简便易行且见效快，理论研究艰苦寂寞且历时长。

### 酝作歌吟荡气回

胡晓军

有话直说是人之初的天性，也是社会之初的状态。文明与非文明的交替、道德和非道德的变换，都会使这种天性和状态趋于消隐，直至缩成冰

山一角，大体是没人海中的。在文明和道德社会，有话直说尽管可能令人不快，却也大致安全；但在非文明和非道德社会，岂止不够安全，更是一件危险的事。若既不愿说假话，也不敢说真话，那么沉默是惯常的选择。但元章先生是不会选择沉默的，何况正值四十二岁的盛年。

那时，元章先生在西宁的一家出版社任编辑。那时，社会上的一大流行便是在各类公共场所大肆书写和张贴“作品”。一日上班，他见众人围观一张社领导作的“七律”，便也凑过去看。看了就看了，干不合万不合说了句“这不是七律”，不久以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被逮捕，一关就是五年。元章先生有“一字一年牢”的诗句，便是此意。

元章先生的旧诗功底，来自庭训。这在百多年前是很普遍的。长期以来，在这个古老的大国里，诗书琴棋是文人的修业而非职业，是文人的底色而非涂色。狱中，元章先生在饱受错愕、愤怒、悲伤和迷惘的煎熬之后，终于定神开悟，居然诗兴大发，幼学在此时成了他明志遭厄、思古喻今、悲天悯人的载体。我以为诗中最富哲思和理趣者，是写历代才子文士一旦近了权贵，岂止不得开心颜，更是难有好下场。反观他自己无意间得罪了权贵，却由此永远地远离了权贵，目下虽惨，却免了将来的更惨和最惨。心中有了诗，笔下有了诗，元章先生几乎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和精神的升华，于是牢狱的归牢狱，心灵的归心灵；周遭



舞 (中国画) 石禅

依旧冰冷沉寂，内心已是温润丰泽，荡气回肠了。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册，取名《九廻肠集》。元章先生对我说，这一百几十首是他最好的诗，随着出狱后生活的逐渐平稳，虽也写诗，却再也无法超越前作了。

元章先生暮年的一大快事，也因《九廻肠集》而起。有位学者读了诗集，专程造访与他深谈，此后出了一本著作，将他与吴昌硕、王国维、陈寅恪诸位大师等而视之。元章先生将此书赠我时，一边表示不克克当，一边则对书中的论点表示欣赏。我读此书，感觉作者之意实为通过这些文人的旧诗，梳理他们在遭遇身心困厄时所走的相近心路历程，所选的相同表达方式，所寄托的相通人生追求，谓之“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”。我还发现，这些文人的出身、专业、创作缘起及成就虽然各异，却一概在诗中取法乎上，以诗史上最

高成就者如灵均史迁、陶令东坡为圭臬。这是大多数文人能从不同原点走到相同终点，殊途同归的捷径，既是旧诗创作思维使然，更是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人文思想使然。

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将旧诗排除在外的，这到底是旧诗的遗憾还是文学史的损失，姑且不论。但正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，百多年来有大批的得益者和失意者，都将其当作了盛放自己或公开、或秘密的思想情感的容器，使后人足以编出一部融华丽与诡异、坦直与隐晦、理念与趣味于一体，极丰富极宏大的现当代旧诗史，与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相比照和参照。我以为元章先生的《九廻肠集》既有士大夫的高尚气节与情怀，又有现代人的权利意识及诉求，前者偏向独立，后者偏向自由。加上结构精严、思情真挚、文辞到位、风格沉郁，理应在现当代旧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那位学者的著作出版于两年前。书中所列八人，元章先生是唯一的健在者。今年，就在这个梅雨季节，元章先生也归去了。我望着窗外漫天的梅雨，心绪如此天气，于人自然不适，于学可最宜，尤其是对编一部中国现当代旧诗史来说，恐怕没有比这种天气更适宜的了。正是——

愁肠九曲未堪哀，酝作歌吟荡气回。困囿五年检旧作，诗词一史同新裁。秉心直语见风骨，倡理启人效竹梅。春尽闻他归去也，目盛梅雨醉千杯。

### 草婴译托翁小说

任溶溶

想起了一件事。就是草婴译托翁小说，得到罗竹风同志的建议。我记得罗竹风同志曾对草婴说，你东译西译，译了许多书，最好集中精力译俄罗斯一位大作家，以你俄文之精通与中文之流利，一定能译出大作品。罗竹风同志还提到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。接下来我就知道草婴要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了。

的确如罗竹风同志所言，草婴精通俄文，中文又好，果然把托翁小说全部成功译出。草婴相信我的中文，把译文给我读，要我挑剔，我一个字也挑剔不出。他的译本的确是了不起的好译本。

草婴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译出来，当年是翻译界的大事件。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。就是草婴译托翁小说，得到罗竹风同志的建议。我记得罗竹风同志曾对草婴说，你东译西译，译了许多书，最好集中精力译俄罗斯一位大作家，以你俄文之精通与中文之流利，一定能译出大作品。罗竹风同志还提到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。接下来我就知道草婴要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了。

###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

秦志华

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大批出土文献材料不断出土，特别是90年代之后，出土文献的发掘与抢救，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。尤其是简帛文献，因其承载的文字量大，信息丰富，内容重要，涉及古文字、古文献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法律等诸多方面，更为学界所瞩目。1990—1992年，甘肃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简牍；1993年，郭店楚简在湖北荆门发掘出土；1998年上海博物馆抢救了一批战国竹简；2002年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出土大量秦简；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抢救了一批秦简；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了一批战国竹简；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一批西汉竹简（2010年又

入藏一批秦简）；1996—2010年，湖南长沙五一广场地区先后出土五批从西汉到三国的简牍；2016年安徽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……今人何其幸，得睹如此丰富多样的简牍文献，且其中多为二千多年来首次面世的内容。我更为有幸，我踏入出版行业不久就参与了出土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第一次接触出土文献，是担任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一）》的责任编辑。在上海博物馆马承源、陈佩芬、濮茅左等先生的包容提点下，非专业出身的我不仅对“上博

没有理由不把巴西电影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标注为五星好评，一个作家，出版了一部新书，他拿着手稿、钢笔，开车来到墓地。在一个慈祥老人的墓碑前，他边流泪，边回想，发生在几十年前巴西一个贫困地区，一段铭心刻骨的童年往事徐徐展开……就像《天堂电影院》，这类题材总会触动我们的心弦，深深打动我们。

这是一部根据巴西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塞塞洛斯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。六岁男孩泽泽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，爸爸失业，妈妈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上班，家有姐姐、哥哥和弟弟。泽泽因为顽皮，总会被爸爸殴打，浑身淤青。看看他做了些什么：火烧隔壁人家的篱笆，扔球打破玻璃；用袜子冒充蛇吓唬怀孕的女人，致使她摔跤；丢石块打破他认为傲慢家伙的头；给教堂地板打蜡，让人滑倒，还吹灭教堂蜡烛；替人出头打架……人们都说他魔鬼附身，他自己也大叫：“我是魔鬼。”影片也表现他的另一面：当别人都不给某位老师送花，独独他课堂献花，让老师感动；尽管他私下对人说“有个穷爸爸真惨”，但还是去街上擦皮鞋换钱给爸爸买香烟；他在湖里钓鱼，为家里改善伙食，只是一时兴起，唱了一首被爸爸认为是讥笑他的歌又遭痛打。他对爸爸说：“你为什么还不杀了我？”对姐姐说：“为什么没人喜欢我？”问妈妈：“我是不是不该出生？”

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得不到爱和温暖的孤独小孩，但影片让他在幻想的天空自由飞翔：他会在泥地上摆放虚拟的飞机，让树叶做机翼；他家后院的一片竹林，被他想象成了动物园，里面有狮子、黑豹、大猩猩，可以被他们编成很多故事……尤其是院子里一棵小小的甜橙树，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乐园。这棵甜橙树会讲话，小说原著这样写道：“有个声音在说话，我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，但是很靠近我的心房。”他模仿树和自己对话，每当有痛苦和欢乐，他们就互诉衷肠；他也会骑上树枝，这时，树就幻化成白色的骏马，带着他飞驰在原野、草地、树丛和湖泊。现实和幻想的两个世界，就这样在他面前交融。

泽泽出众的想象力，被一个叫麦纽·瓦拉达赫的葡萄牙人发现，可惜不久他因车祸去世。电影片尾的字幕里，有原作者的题词：“我最深切怀念献给麦纽·瓦拉达赫，他在我六岁时，为我展示了温柔的意义。”这个葡萄牙人，改变了泽泽的人生轨迹。有意思的是，泽泽和他最初见面，是把他当成“敌人”看待的，当泽泽踩着他漂亮小汽车的保险杠，被他打屁股时，泽泽发誓长大后要杀了他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葡萄牙人为泽泽偷摘别人家芒果而被玻璃割破的脚疗伤；带他到自己家里，教会他生活礼仪；告诉他其实每个小孩心里都有自己的“恶魔”，不可避免；开车一起兜风，一起去湖边钓鱼；赞赏他的“动物园”，因为它在他的头脑里，要求他每次见面都要讲一个新故事……电影中有两个场景很感人：当泽泽沮丧时说要坐火车离开，葡萄牙人担心地去铁道边，最后看到泽泽躺在夜晚的草地上才放心；大树下，泽泽渴望成为葡萄牙人的儿子，望着满身乌青的泽泽，葡萄牙人答应帮助他，就像他爸爸一样，直到永远，还送给他家里的传家宝——一支钢笔，“写下你脑海中的这些故事”。

泽泽真的用这支笔写下了第一个故事，这是在葡萄牙人和火车相撞去世后。他不再顽皮，不再像“魔鬼”，长大后，他成了一名作家，写下葡萄牙人希望他写下的故事。在葡萄牙人的墓地，泽泽用心里流出来的文字——一本讲述他们故事的小说，来纪念他们如父如子的友情。令人感慨的一幕在片尾：当泽泽开车驶离墓地，和几十年前葡萄牙人带他兜风时一模一样，从驾驶室探出脑袋，只不过，这一次，他不再是嘴上无毛的稚童，而是胡子拉碴、历经风霜的中年人了。

### 我亲爱的甜橙树

刘伟馨

### 遇见你

郑自华

上海书展，差不多每年都去。到书展，除了买书，就是想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作家。2007年去书展，看到老上海活字典沈寂，2011年去书展，看到上海人熟悉的作家程乃珊，她的笑容，她的发型已经在上海人的印象中定格。这两位作家已经去世多年了，有幸买过他们的书，并请他们签名，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。

在书展遇见作家，这并不稀奇，但是，每次都能遇到同一个爱书的朋友，而且事先没有约定，这就不能不说是个神奇的故事了。卢雪坤，我的同事，曾经插过队，卢兄喜欢旅游、集邮、摄影、看书，卢兄住虹口，我住杨浦，退休以后，一年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。卢兄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书展，我也是爱书之人，每年书展我也是常客。我和卢兄从来没有约过在书展碰到，这几年，每次都和卢兄在书展碰到。在书展碰到，自然很惊喜，大家会交流一下买了什么书，最近看了什么书，然后分手，各人去寻找各人喜爱的书。想想也有意思，书展为期一周，每天开放时间要十几个小时，要接待上万个读者，布展面积几万平方米，几个楼面，东馆西馆，每天要有几十场的签名售书活动，地方之大，人数之多，简直就像进入迷宫一般。有一年和书友约定在书展见面，一直用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，所以能和卢兄遇见，实在是件奇妙的事情。2017年书展前，我微信卢兄：书展去吗？他说估计去不了，因为家里刚添了个小孙女，做爷爷的马前鞍后围着孙女转。8月17日上午，我在书展刚参加完美女作家羽涵的《遇见你》签名售书活动，然后到处转悠，在一家出版社的柜台翻书，抬头起来，竟然发觉站在我对面的是卢雪坤。天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喊道：“刚刚参加《遇见你》的签名售书，怎么立马就遇见你了？”卢兄也惊呆了，接着，大家共同说了一句：“缘分哪！”既然是缘分，于是在“砥砺奋进的五年”巨大标语前，两个人第一次合影留念，时间定格在上午10:40。为了表示纪念，我和卢兄在书展门票上互相签名留念。卢兄告诉我，有了孙女，和朋友聚会、集邮、旅游、摄影的爱好都取消了，唯独，书展是一定要来的。这次到书展，也是硬挤时间出来的，到书展就是为了感受书香气氛，闻闻书香味，不一定买书，能看看就心满意足，上海有这个书展，真好！以后等孙女大了，每年都带她参加书展。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呆了两个小时不到的卢兄不得不和我告别，似乎这2个小时就是为了和我见面。

有人说过：于茫茫人海中，遇见你我所遇见的人；于时间的无涯旷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没有晚一步，刚好遇到了。这就是缘分。两个男人，还是两个老男人，只是喜欢书展，喜欢看书，在书展相遇，仅此而已。



读碟

十目谈  
古籍新韵  
责编：郭影

一组《文艺家谈初心》，责编：吴南瑶。